

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

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

[美] 瑞安·毕晓普 等著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
戴阿宝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

[美] 瑞安·毕晓普 道格拉斯·凯尔纳 等著
戴阿宝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美)瑞安·毕晓普 道格拉斯·凯尔纳等著;戴阿宝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9

(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

ISBN 978-7-81091-853-4

I. 波… II. 戴… III. 波德里亚(1929~2007)—思想评论—文集 IV. B56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240 号

责任编辑 武新军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17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马克思曾批评旧哲学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不知道更重要的工作乃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性品格而著称。

孔夫子的解释学亦侧重于学以致“用”的方面，例如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显然，对他而言读诗的最高境界不在诗内而在诗外。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描述说：如今人文知识分子已从过去的“立法者”蜕变为“解释者”。鲍曼将前者视为现代性，后者为后现代性。其价值倾向，这里不去究问。

因此，当我们将丛书定名为“赫尔墨斯”云云是否便意味着一个消极的和保守的计划呢？

2 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

赫尔墨斯，源出于古希腊神话，在他的诸多职能中，以作为神的信使最著名，因而“解释学”(hermeneutics)就是由他而来的。“在所有西方语言中，赫尔墨斯词源意味着：表达和辩术、转译和解释。”(贝尔纳·斯蒂格勒)

但是，我们所理解的“赫尔墨斯”却并不仅仅是“解释”，或仅仅局限于不及物的“认识”。解释学有待于重新解释。

第一，“解释”本身其实就孕育着“改变”的种子。我们何以要解释？“解释”不是解释行为的目的。“解释”是去蔽，是揭开隐藏的真理，是神话中所谓的“传达神的旨意”。对世界的“改变”当依赖于先于对它的“解释”或“认识”，因为毫无疑问，人是理性的动物。“解释”总是为“改变”构筑蓝图。“改变”自然也会反过来确认和修正“解释”。

第二，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其本职工作在于“解释”，在于为最终的“改变世界”提供合乎真理的知识。一个人文学者固然可以带着他的知识去从事其他职业，去做觉醒了了的浮士德，但他将不再是学者了。学者以学术为业，以学术向世界说话。在他，“言”即是“行”，言行不二，以言行事。

因而我们的“赫尔墨斯”代表着坚守学术本位而又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解释世界”意在“改变世界”，或者说，“改变世界”先已内在于而不是拘禁于“解释世界”。

进入新世纪，我们是愈益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力量的冲击和挑战。《共产党宣言》所期待的“世界文学”虽未实现，远未实现，但已在缓缓地向我们逼近了。而倘若把“世界文学”视为一个过

程,那么它实际上早已开始。全球化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生活在变,知识在变,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在经历着某种转型。

全球化对学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超越民族之“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世界文学”视野,要求解决世界共同问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无权选择“国际性”,就像我们无权选择事实一样。“国内学术界”正在汇入“国际学术界”。“国际性”已表现为当前学术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被裹挟于其中。我们只能向“国际前沿”走去。否则,便不得不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

丛书提出一个“论文书”的概念,是有针对性的。近些年,形式上的“厚”“重”“大”书很受追捧,而一些很有学术分量的论文却难以找到恰当的方式面世:杂志嫌它长,出版社嫌它短,科研管理部门嫌它是“论文(集)”而不是“专著”。异乎此,我们则坚信,要发展学术,首要的是从一篇篇的论文做起,然后庶可形成真正的大书。

设立在百年老校河南大学的“河南省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自建立之日起就以开放的姿态和视界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学术研究,近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现在,中心主任张云鹏教授出于对学术发展大势的把握,以前瞻性的目光,又将这套以“赫尔墨斯”为宗旨的丛书列入中心的工作日程。丛书有了“家”,有了“温暖”,但也更有了不容懈怠的“责任”。我们组织者个人能力有限,惟望得到海内外学人的不吝支持。学术是大家的事业,远的说,也是全人类的事业。

我们不敢对丛书做过高的期许,但我们会以较高的标准要求

4 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

丛书，以敬畏之心对待我们的学术事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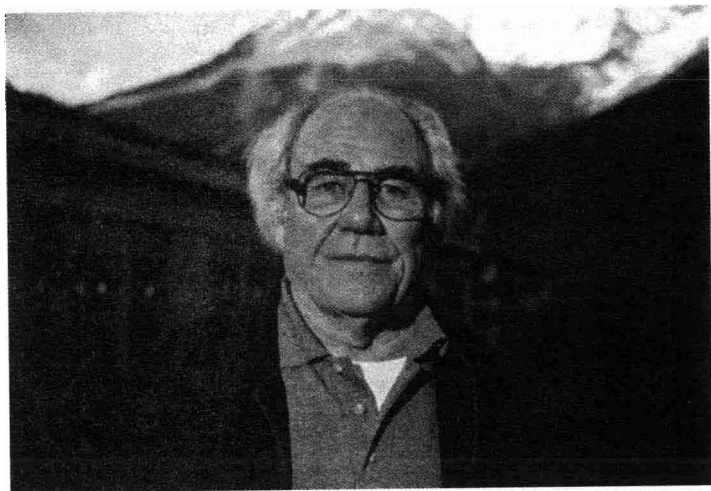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高
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

2008年3月4日

目 录

总序(汝信)	(1)
让·波德里亚(1929—2007)(道格拉斯·凯尔纳)	(1)
关于波德里亚《论消失》的几点思考(道格拉斯·凯尔纳)	(32)
波德里亚、死亡与冷战理论(瑞安·毕晓普)	(38)
亚利桑那自我中的东部时间:波德里亚论猿猴的行星 (约翰·贝克)	(67)
让·波德里亚论人的目的(约翰·W P. 菲利普斯)	(88)
波德里亚和邪恶精神(瑞安·毕晓普 约翰·菲利普斯)	(103)
拟真时代抵制意义:波德里亚的《仿像与拟真》(托尼·希)	(127)
天鹅之路:在超真实中关照自我(马克·波斯特)	(136)

译后记	(173)
-----------	-------



让·波德里亚(1929—2007)

道格拉斯·凯尔纳

2007年3月6日,让·波德里亚在与癌症长期抗争之后在巴黎病逝,享年77岁。由于波德里亚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

义理论的联系，很难将他置于传统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关系中^①。他的研究包括哲学、社会理论以及极具个人色彩的文化形而上学，其思考点落在具有时代征候的重大事件上，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提出了尖锐批判。尽管波德里亚还可以作为这样一位思想家来阅读，即他以独创的和颇具争议的方式把理论与社会的和文化的批判结合起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形式，但他通常被视为法国后现代理论的一位重要的精神领袖。他是一位极其多产的写作者，出版了超过 50 部著作，对当代最重大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做出评论，包括全新的后现代消费、媒介和高技术社会中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差异的抹擦，艺术和美学角色的变换，政治、文化和人类的根本性改变，新媒介、信息和控制技术在构造一个不同质的社会秩序时的影响，对人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变革的促进等。

早期写作：从《物品系统》到《生产之镜》

让·波德里亚于 1929 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天主教城镇兰斯(Reims)。他曾对采访者谈起，他的祖父母是农民，他的父母成为城镇居民(Gane, 2000)。波德里亚还自称他是家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这导致了他与父母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① 关于我较早时期的波德里亚研究，参见凯尔纳 1998a；贝斯特和凯尔纳 1991；凯尔纳 1994 和 1995，第八章；以及贝斯特和凯尔纳 1997，第三章。

1956年,波德里亚开始作为一名中等教育的教师在法国的一所高级中学(大学预科[Lycee])工作。60年代早期,他在法国的赛依(Seuil)出版社做过编辑。波德里亚最初是一位德意志文学专家,1962—1963年期间,他在《现时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的文章,并且把彼得·韦思(Peter Weiss)和贝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作品以及一部由魏海姆·穆尔曼(Wilhelm Muhlmann)写作的关于弥赛亚革命运动的著作翻译成法文。在这一时期,他阅读和研究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作,前者的日常生活批判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后者对当代社会的符号学分析持久地影响了他的研究。

1966年,波德里亚进入南特的巴黎大学,成为列斐伏尔的助手,在此期间,他研究了语言学、哲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也是在1966年的南特,他以博士论文《物品系统》(Le Systeme de Objets)为他的社会学“第三周期的论题”(These de Troisieme Cycle)辩护,并在同年10月开始在南特教授社会学。为了反对法国和美国对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侵略战争,波德里亚在60年代与法国左翼建立了联系。南特是一个激进政治的大本营,与丹尼尔·科恩—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和疯人派(Enragees)相关的“3·22运动”开始于南特社会学系。波德里亚后来说过,他参与了1968年5月的事件,这一事件导致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一次总罢工,几乎是促使了戴高乐的倒台。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波德里亚开始出版最终使他享誉世界

的一系列著作。由于受到列斐伏尔、巴特和其他法国思想家的影响——这些影响将在下面加以讨论，波德里亚从 60 年代开始专心研究社会理论、符号学和精神分析，1968 年（1996 年英文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物品系统》（*The System of Objects*），随后在 1970 年（1998 年英文版）出版了《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1972 年（1981 年英文版）出版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这些早期的出版物，在批判社会学的框架之内，尝试着把列斐伏尔 1947 年开创的日常生活研究与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社会符号学结合起来。受到巴特的影响，这一研究集中于消费社会（他的前两部书的焦点）中的物品系统以及政治经济学和符号学（他的第三部著作的核心）之间的联系。波德里亚的早期著作最早运用符号学来分析物品是如何被构造为当代媒介和消费社会的符号和意义的系统编码的。把符号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社会学结合起来，波德里亚开始了他生命中漫长的探索构造我们日常生活的物品和符号系统的工作。

早期的波德里亚，描述日常生活中物品的意义（比如通过一个人驾驶的汽车识别他的权力），描述在新的现代社会里组织物品的结构系统（比如新赛车的魅力或符号价值）。在他的前三部著作中，波德里亚指出，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由关于符号的符号学理论来补充，符号学理论使得能指（如语言）所指涉的不同意义在意义系统中相互关联。继巴特和其他人之后，波德里亚主张，时尚、运动、媒介和其他的表意模式还生产具有特殊

规则、代码和逻辑的意义系统(波德里亚在某种相互关联中使用这些术语,下面有更详尽的说明)。

把符号和日常生活的分析置于一个历史框架之下,波德里亚指出,从早期市场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需要持续关注需求的调控、消费的扩大和引导。在这一历史阶段,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提高需求这样的要求增加了对降低生产成本和扩大生产的关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经济规模、新的生产技术和新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大规模生产的能力;资本主义企业把注意力日益集中于消费的管理和创造新的有魅力的产品,生产出波德里亚称之为的“符号价值”。

据波德里亚分析,广告、包装、展览、时尚、“解放了”的性、大众媒介和文化、商品的激增,符号和景观数量的扩大,导致了“符号价值”的迅速增值。因此,波德里亚争辩说,商品不仅如马克思的商品理论所说的,以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为其特征,而且符号价值——风格、声誉、奢侈、权力等的表达和标志——成为了一种持续增长的商品和消费的重要部分。

从这一视角出发,波德里亚宣称,商品的买卖和展览,其符号价值如同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商品和消费的基础性构成部分。这一立场是受维布伦(Veblen)的“炫耀性消费”概念和《有闲阶级理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994)中对商品展示分析的影响,波德里亚认为,这一现象已经在消费中扩展到每一个人。对于波德里亚来说,整个社会围绕消费和商品展示组织起来,通过这一途径,个人获得声誉、身份和地位。在

这一系统中,一个人的商品(房屋、汽车、服装等)越高级,他在符号价值王国中的地位就越高。正如词语表达意义是根据它们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的位置一样,符号价值表达意义同样是根据它们在不同的声誉和地位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在《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 1998)一书中,通过赞美针对社会规范、炫耀性消费和遵奉习俗者的思想和行为的“多种拒绝形式”,波德里亚总结道,所有这一切都在“激进变革的实践”中被整合在一起(1998:183)。波德里亚在这里暗示一种期待,“猛烈爆发和突然失衡的到来,如同不可预见但确切无疑的68年5月,毁灭了这一真诚的(消费)大众”(1998:196)。另一方面,波德里亚还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异化是如此地总体化,以至于它无法被超越,因为“它成为市场化社会的结构”(1998:190)。他的观点是,社会里的一切都成为商品,都可以买卖,异化是总体性的。确实,“异化”一词最初是指“出售”,在一个总体商品化的社会里,一切都成为商品,异化无处不在。再有,波德里亚提出“超验的终结”(一个从马尔库塞那里借用的术语),在此,个人既无法体察自身真实的需求,也无法体察其他的生活方式(1998:190ff)。

到1970年,波德里亚已经把自己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区分开来,假定了在一种“无法预见但确定的”形式中抵抗消费社会的可能性。在60年代后期,波德里亚加入到一群围绕在《乌托邦》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中间(参见Baudrillard, 2006),探寻克服学科界限,以及依据居伊·德波(Guy Debord, 1970)和情境主义国

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精神把不同的社会、建筑和日常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思考。通过在建筑、城市规划、文化批判和社会理论的边缘使个体聚集起来,波德里亚和他的合作者们把自身同其他的政治和理论团体分离开来,在已经建立的学科和政治倾向的界限之外,发展出一种极具个人风格和边缘化的话语。这一与《乌托邦》的联系只持续到 70 年代早期,但是它或许帮助波德里亚产生了一种在边缘从事研究的欲望,一种远离主流和新潮、构建自我的理论立场的欲望。

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描述了个体是如何被统治机器和思想模式加以控制的,与此相比,波德里亚的研究可以被解读为是对物化和社会控制的更进一步的论述(Kellner,1986b)。波德里亚超越法兰克福学派,把有关符号的符号学理论应用于描述商品、媒介和技术,描述它们是如何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幻觉和想像,在这里,通过消费价值、媒介意识形态和角色模式以及如提供赛博空间世界的计算机这样的诱惑性技术,个体成为一种超级权力。最终,波德里亚从他对符号和物品系统控制的分析中引出一个悲观主义的结论,他总结说,法兰克福学派所勾勒的“个体终结”的主题,通过物品在总体上战胜人类主体,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参见下面)。

然而,比起法兰克福学派把消费一般性地描述为社会整合的被动模式,波德里亚的部分写作拥有某种更为积极的消费理论。相比而言,在波德里亚的早期写作中,消费本身是一种劳动,“一种积极的符号经营”,一种把自身置于消费社会的方法,通过劳动

区分自我与他者。然而，这一积极的符号经营不等同于假定一个积极的人类主体的存在，他可以抵抗、重新定义或生产自身的符号，因此，波德里亚没有成功地建构出真正的能动理论，尽管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保持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一种反叛消费和媒介社会的姿态。

波德里亚最初的三部著作可以在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来阅读。你或许把波德里亚对消费的强调作为对马克思分析生产的一种补充，而把他对文化和符号的强调作为对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补充，为马克思的工程添加了一个文化和符号的维度。但是，波德里亚在 1973 年的《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1975 年被译成英文)一书中发起挑战，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抨击，宣称马克思主义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面镜子，把生产放在生活的中心，从而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自然化了。

尽管在 60 年代波德里亚参与了 1968 年 5 月的重大事件，并与革命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但是在 70 年代早期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决裂，与同一代的其他人拉开距离，只不过还一直保持激进的政治态度。如同许多左派人士一样，波德里亚失望于法国共产党没有支持激进的 60 年代的运动，他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也不信任，他发现了阿尔都塞的教条和抽象。结果，波德里亚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激烈的批判，这一点被他的同时代的许多人所重复，也带来了后现代转向(参见 Best 和 Kellner, 1991 和 1997)。